



王献唐研究丛书

李勇慧 撰

王献唐

著述考

山东少年治学者惟法一人。

——黄侃1931年评王献唐

遗稿查虚书藏，敬佩山左文化五体投地。

《封泥》 国一代名作，先生实一代传人。

——上海《晶报》 主编张丹翁1936年致王献唐函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献唐研究丛书

王献唐

2012年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著述考



李勇慧 撰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献唐著述考/李勇慧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王献唐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8-6723-3

I. ①王… II. ①李… III. ①王献唐(1896~1960)
—文集 IV. ①Z4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8718 号

王献唐研究丛书

王献唐著述考

李勇慧 撰

-
-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36.25 印张
字 数: 5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723-3
定 价: 138.0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王献唐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陈其泰 安可苻 吕伟俊 谭世宝
王运堂 王福来 丁原基 孔垂长
刘德龙 赵炳武 温玉川 陈 炎
刘 锋 于化民 徐 雁 杜泽逊
方 辉 张廷银 李西宁 张广存

主 编 李勇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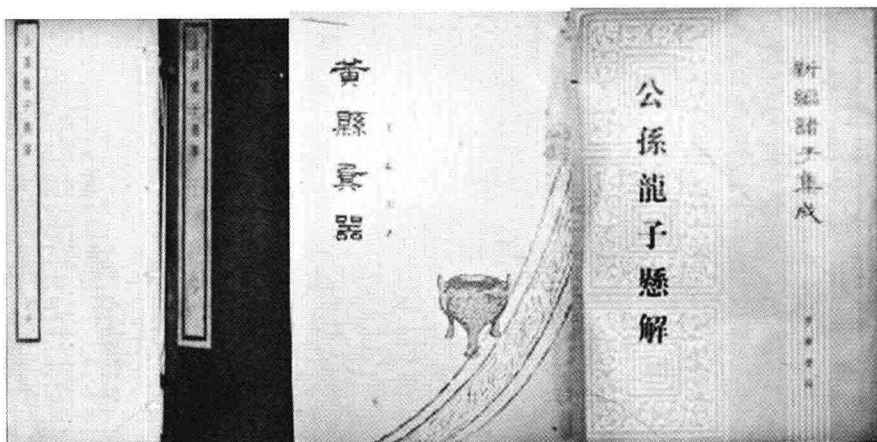
副主编 张书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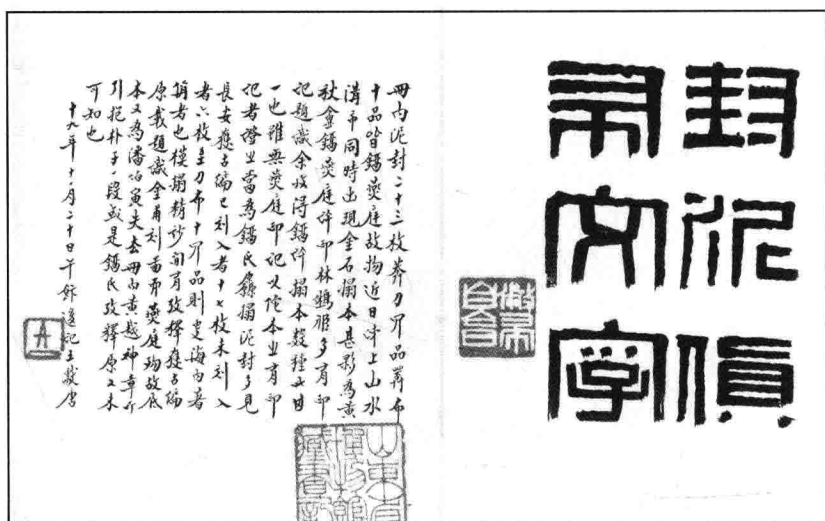
于 芹 王 珂 王艳丽 毕晓乐
李勇慧 辛显敏 张书学 张逸洁
赖大遂 樊庆臣



王献唐像(3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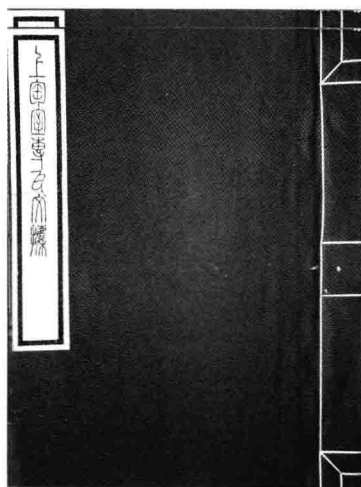
《公孙龙子悬解》、《黄县真器》



《封泥货布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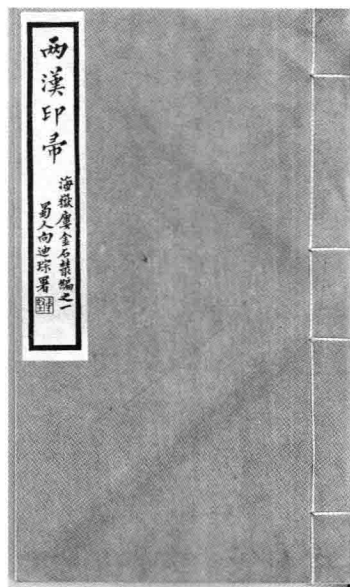
丕烈校《穆天子传》封面



《上陶室砖瓦文拮》封面



《杨太后宫词》王献唐题签函套



《两汉印帚》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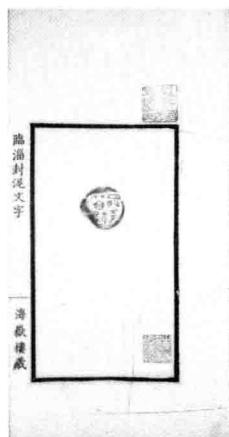
《明湖顾曲集》



《勉行堂印存》题辞



《汉魏石经残字叙录》



《临淄封泥文字叙》

《王献唐研究丛书》序

杜泽逊

李勇慧博士积多年心力撰写的《王献唐研究丛书》系列成果七种即将出版，属余作序。我想有些情况还应当谈一谈，或许有利于读者认识这一组成果的分量。

勇慧博士是山东大学历史系 1981 级本科生，大学毕业即就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以后长期从事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而该馆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是国学大师王献唐先生。王献唐先生在山东省图书馆历史上是最有学问的、成就最大的一任馆长，同时也是山东省博物馆的创始人，可以说是现代山东图书文物事业史上的第一人，其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成就，影响了现当代图书文献、金石考古、书画艺术等各个领域。时至今日，献唐先生的片楮只字都成为收藏者的宝贵财富，只言片语都是文史研究者搜集的对象。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山东历史上还有聊城傅斯年、曲阜孔德成、鱼台屈万里、临清季羨林、平原任继愈、栖霞牟宗三、荣成张政烺、菏泽何兹全等多位，构成了现代山东学者群，这个学者群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可以说举足轻重。

王献唐先生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的大量著作没及时刊行，人们在近几十年间方便查阅的王氏著述，只是一小部分。台湾东吴大学丁原基教授，作为孔德成先生的高足、山东日照籍学者、王献唐先生的邑后学，是率先研究王献唐先生生平学术并写出专著的人。由于资料陆续刊行，这项研究还需要不断扩充。勇慧博士近水楼台，获得了大量献唐先生著述资料和其他生平活动资料，在该领域持久不懈地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由此获得山东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勇慧博士的这组成果包括《一代传人王献唐》、《王献唐著述考》、《王献唐年谱》、《王献唐往来书札辑注》、《双行精舍序跋辑存三编》、《王献唐诗书画印辑注》、《王献唐佚文辑存》计七种，在王献



唐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新时期的最好成果，在近代学术文化史研究领域也是值得重视的重要成果。

笔者与勇慧博士有共同爱好，那就是山东地方文献研究。笔者的业师王绍曾先生主编有《山东文献书目》，是这二三十年间研究山东文献的基本参考书。笔者受先师影响，很早就知道王献唐这个名字，后来与王学典教授规划了《山东文献集成》项目，经过六年努力，终于完工，共影印山左先贤遗著 1300 余种，其中一半为未刊稿本抄本。这批文献有不少是当年王献唐先生辛苦搜集整理过的，如《许印林遗书》、《鱼台马氏丛书》、《单县时氏音学遗著》等都是荦荦大者。我们在《集成》快要结束时，特别恳请王献唐先生的儿媳安可苻女士、文孙王福来先生等，把献唐先生的手稿较为系统地影印收入《山东文献集成》。得到大力支持，惠借图像。经过我们同人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王献唐先生遗稿》四十种附录三种，影印成 14 大册，为《山东文献集成》殿后的巨编，正如王献唐先生为先贤汇聚遗书一样，我们也有义务为献唐先生汇聚遗书，影印刊布。笔者还受安可苻女士委托，整理《王献唐先生师友书札》，由青岛出版社影印出版。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勇慧博士和张书学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我想，这是献唐先生精神的继续。我们作为山东后学，甘心情愿多做一些这类整理先贤遗著的工作，为古人续命，与后人方便，我认为这是古文献学工作者的使命，希望这一传统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希望今后的青年一代取得更可喜的新成绩。我想这是我和勇慧博士共同的期待。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杜泽逊序于山东大学向岚书室

再现“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学者”的风采

陈其泰

李勇慧博士的学位论文《王献唐研究》积六个寒暑的艰辛劳动撰著完成，共60万字，在2011年5月举行的论文答辩会上，获得七位答辩委员一致的高度评价。现这部专著即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付梓，勇慧博士嘱我作序，我无有推托的理由，也乐于借此写出一些感受。

这部专著确是内容厚重、极见功力的佳作，其最大特色，是论题新颖，立意高远。王献唐先生(1896—1960)主要活动于20世纪20至50年代，是一位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但李勇慧博士以王献唐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何以言之？王献唐二十几岁时就在山东地区崭露头角，他是一位奇才，学识渊博，生平对于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等领域均有著述，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也深有造诣。据本书作者搜集、考订，其可考之论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达62种，单篇论文及题跋等1300余篇，诗词歌赋逾500首。王献唐在1929年以后，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主管山东文博工作逾30年，对于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现代图书馆及文博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山东乡邦文献锐意搜罗整理，编纂《山左先哲遗书》，乡贤未刊之遗著多赖以传，兼收钟鼎彝器、泉币、封泥、石刻，耗费大量心血进行整理、拓印，使之得以流传，当时他所主持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即被誉为“北方图书文物之重镇”。王献唐又有广泛的学术交游，他与近现代著名学者如罗振玉、傅斯年、吕振羽、王重民、傅增湘、柳诒征、孔德成等一大批人士，均有过学术切磋或书信往来。因此，1984年著名学者张政烺、夏鼐两先生致函文化部，请求对王献唐先生之遗著及其所搜集的山东先哲遗书稿本及时采取得力的保护措施，以免这些具有重要学术



价值的文献散失，函中即评价王献唐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对 20 世纪学术文化史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长时间来却似乎被淡忘了，关于他的研究成果极其少见，甚至近年报刊上偶有文章提到王献唐时，竟称其“生平不详”，也有将他误为清代人的。这种情况与王献唐应有的学术地位是多么不相称，与发展学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又是多么不相合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时过境迁、往事无人提起之外，还因为史料大量散佚，搜集至为艰巨，以及王献唐的生平活动、学术研究涉猎范围太广，一般人难以梳理和驾驭，望而止步。总之，研究这一课题需要具有识力与勇气，还要具备功力与毅力。勇慧博士就是这样一位有勇有识，有志攻坚的年青学者。她选择这一题目，以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时，就表明她怀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决心要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她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即到山东省图书馆工作，二十几年寝馈于斯，不仅充分了解图书馆事业和文献学研究的意义，更充分认识老馆长王献唐的成就、精神和价值。博士论文的撰写历时六载，据她讲，常常几乎是彻夜用功，分秒必争地读书、写作。而在此之前的准备，则是到处辛苦奔波，搜集散落各处的史料，仅从济南到青岛访查资料就往返十几次。作者撰写了百余万字的《王献唐年谱资料长编》，以及《双行精舍序跋辑存三编》、《王献唐档案资料汇编》等，如将这些前期工作加起来，勇慧博士为撰著这部书稿则历时近二十年。有一位哲人说得好：“你只有把生命投入进去，你写的东西才有生命。”本书确是作者把生命投入进去之作。难怪在答辩会上有一位答辩委员说：“读了勇慧的论文，感到震撼！”我相信本书出版后，读者之中产生类似的感觉者当为数不少。唯其立意高远，资料详备，对研究对象有全面而透彻的把握，作者才能做到将这位成就卓著的大学者丰满而可信的形象再现在我们面前。

本书又一显著特色，是提纲挈领，分析精到。作者的指导思想，是要对王献唐作“结账式”的研究，即要对其进行全方位、总结性的研究。本书引据史料之丰富和扎实，殊为难得，大多为首次公开或前人尚未利用的第一手资料，如《王献唐日记》百余万字，王献唐师友往来书札近千通，海内外之相关档案文献近二百件，未发表的题跋近六百篇，还有其大量诗词作品，堪称洋洋大观。作者经过认真爬梳考辨，整理分析，无论从家世生平、学术渊源、师

友交游、治学风范和学术创获、社会影响等项，无不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极善于做提炼和概括的工作，“以简驭繁”。作者把丰富的收获、感受上升到“事功与学术双峰并峙”这一总体认识，这就为王献唐的生平成就作了准确的历史定位，是作者的重要创获；而在内容安排上，则以此作为全书的主干展开论述，纲举目张，复杂的内容由于精心的提炼，而显得主次分明，条理清楚。

关于“事功”，作者归纳为王献唐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和对近代文博事业的贡献两个方面作充分的论述，并予以精到的分析评价。王献唐于1929—1948年任山东省图书馆长达20年，书中称这“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以其卓越的贡献成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其中，尤以他出任馆长至抗战之前9年时间为鼎盛期。“此时，王献唐既重视对图书馆的管理与革新，又注重地方文献之搜集与保护；既重视为读者服务，又重视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培养出屈万里、牟祥农等数名图书馆学专家和文史学者。他主持编撰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山左先哲遗书》、《海岳楼秘籍丛刊》、《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等等，皆反映其办馆理念与学术成就，在保护‘国粹’、传承‘国学’方面，为其它图书馆树立了典范，使山东省立图书馆名闻遐迩，成为北方最著名的图书馆，（江南以柳诒征主持的江苏国立中央图书馆为代表），山东馆也达到了百年建馆历史之顶峰。”有王重民的信函为证：“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经过作者的发掘、梳理、诠释，担任馆长的王献唐理念之先进、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有力，在其管理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有生动的体现。建馆之初，他制定了九份规章制度，包括《组织章程》、《购藏新书简明程序》等，“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又刊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首期之上，以便“社会各界有效监督”。又如，当时图书分类存在难题，因为要学习西方分类法，但又与中国图书分类“畸重畸轻”，王献唐于1932年对《馆藏图书细则》继续修订，对分类进行创新，“结合中国图书实际，将所隶数量甚少之‘宗教类’并入‘哲学类’，代之以吾国图书数量较多之‘经学类’，又把‘理科’改为‘自然科学’”。王献唐的分类法一直影响到建国以后，成为“现当代图书馆普遍采用之鼻祖之一”。日寇侵华，抗战爆发，王献唐惧馆藏善本图书与文物精品陷于敌手，或毁于兵燹，乃请当局，将珍



品于1937年10月起迁出济南,先后所运者31箱。这批图书文物首运曲阜,托奉祀官府代为保管。至12月,王献唐不顾时局动荡,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在既无政府支持,又无经费援助的情况下,毅然亲自护送其中最珍贵的图书文物共5箱至四川乐山大佛寺,完成了为此亲自守护九载的壮举!作者指出:“王献唐南迁文物,包括山东馆与山东金石保存所成立三十年来收藏之金石古物、书籍珍本及字画。因此,这次载书远播,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与抢救齐鲁文脉与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有三类:一为古籍善本,共438种2659册;二为书画类,共143种182件;三为金石,包括陶瓷、玉器、铜器、甲骨等共734件。“多属稀世文物图籍,是山东省图书馆数代人几十年的珍藏,也是齐鲁文化的瑰宝精华乃至中华文脉之所在。王献唐保存珍籍于炮火之中,其功绩无法估量。”王献唐视“文化是我们的骨髓”,自觉地担当民族文脉的守护人,故倾尽全力保护,历尽艰辛,个人与家庭的牺牲,在所不惜。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南迁图书文物全部妥善运回济南,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因而有学者对王献唐守护之功盛赞曰:“虽百世之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

将山东省立图书馆的管理建设,与山东地方文献之收藏、研究、传布结合起来,是王献唐又一重要业绩。他以图书馆长之职兼任“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包括:对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对金石文物(汉代画像石、秦汉砖瓦、封泥)的收集与整理;对金石文物的典藏与陈列。1933年6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即有文章称誉王献唐的工作:“国内图书馆以藏书之多言,首推北平之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保存古器物之丰言,殆无出山东省立图书馆之右者(北平古物则别有故宫博物院、历史陈列馆等之搜藏)。故富于历史博物院的性质,实可谓为山东省立图书馆特色之所在。而该馆亦善能利用其优越的历史地理之环境(齐鲁故壤为大圣贤之故乡,又为三代以降古文明之所萃),搜藏发扬,不遗余力。”此期间,各地学者来山东省馆参观者络绎不绝。顾颉刚于1931年5月参观后在日记中记曰:“闻王馆长主持此馆二年,搜罗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种。近为海源阁藏书事,奔走各方,至为劳碌。室中所悬书画,亦多新搜得之乡先达作品。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此馆必将巍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相关史料,皆分散于档案、信札、日记、回忆文章或旧日报刊之中,

作者独具慧眼将它们发掘出来,予以恰当的解读,这些看似孤立的事实或枯燥的档案史料的价值立即凸显出来,使王献唐的业绩与精神得以重现,并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关于“学术成就”方面,书中对王献唐文字音韵与训诂,金石考古与史学,目录版本与校勘学,文学与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成就,均作了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论述。王献唐治学范围如此广博,本书作者却能做到对其著述内容和其价值都进行深入钻研和评价,再现了其“一代宗师”的学术风采,并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

视野开阔,而又努力作深层次的开掘,是本书的又一显著特色。要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诚然戛戛其难,然而对于要拿出高质量成果的研究者来说,却是必须具有的。作者做的是对王献唐的学术作个案的研究,但她又充分自觉地将之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和学术进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和把握,所以极其重视发掘王献唐之学术交往和社会网络的材料,用足够的篇幅进行论述,仅在“王献唐师承与交游”一章就各设专节来分析许瀚、陈介祺、刘喜海以及西学与国学等师承,和与丁惟汾、傅斯年、黄侃、吕振羽、孔德成等人的学术交往;其它章节行文所及,对于王献唐与罗振玉、王重民、张元济、傅增湘、李济、梁思永、高亨、丁福保、陈直、叶圣陶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友好往来、切磋学术也均予以揭示,“溯源析流,左右参证”。为了客观地论定王献唐领导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图书文化事业中的地位,书中又有意识地将之与同时期的北京、南京、浙江、上海等多所著名的图书馆、博物馆作比较研究。作者这样做难度极大,然而成果至丰,不仅让我们读到一位生平行事酣畅再现、精神气韵跃然纸上的近代大学者,而且读到民国时期从山东到北京,从东南到西南各地学术文化活动的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毫不夸大地说,本书在研究王献唐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民国时期文化学术史的大量有价值知识。

在本文开头,我就讲到本书是“极具功力的佳作”,本书篇幅甚大,然则,作者对于王献唐生平、学术、成就的每一问题的论述,对于书中引用的每段史料的考订、分析,甚至书中数以千计的知识性很强的注释,其撰写和处理,都是认真负责,严肃从事的。作者的专业领域是历史文献学,本书也首先以文献资料搜集丰富完整、考辨工作精心细致为特点,而可贵的是,作者不以资料详赡、考订精确限制自己,她更重视发掘和阐释史料背后蕴藏着的有思



想价值的东西,要写出贯穿于王献唐丰富的活动和论著中的精神和灵魂,因而大大提高了这部著作的创新性和思想性。这类例证,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前面所论及的也大多与此直接相关。这里再举王献唐与吕振羽的学术交往为例。吕振羽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他在1934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史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中,感谢其师李鹤鸣(李达)在理论上的指导,而在材料的选择上,感谢“山东图书馆长王献唐先生等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和指导”。作者通过分析1932年秋吕振羽来济南访问王献唐,王亲自带他参观馆藏善本古籍、历代遗物和出土文物,并互相交流切磋,以及1932年、1935年吕两次致信王献唐等史料,认为:吕振羽当时刚开始研究古史,他著作中有多处重要观点,确与到山东馆参观出土文物,以及王献唐对他的提示和借阅书籍、文物拓片等直接相关。如,吕在书中有一个大胆的推断,认为商民族立国之初,活动地区为河南南部山东西部,其后的发展,“系由东向西移动”。本书作者分析说:“这一结论,除了征引一些传说与文献记载外,主要是根据王献唐介绍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而得出的。吕振羽在写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时,《城子崖》的发掘报告尚未出版,但王献唐的介绍却使之较早地利用了这一发掘成果。吕振羽在书中写道:‘据王献唐先生对我说,此次出土除石器外,并有陶器,从色素上可判定为同一文化系统之遗物;同时出土者还有甲片,其灼制情形与殷墟出土者亦无别,只是殷墟出土者为字片,此处不曾发现字片。’根据这些特点,吕振羽断定商族是由东向西发展的。这一结论,至今还被许多学者所接受。”还论述了吕振羽在书中提出商代“已找着一点铁的形迹”等项,也与王献唐提供的资料直接有关。作者根据多方面的分析,最后说:“可以看出,王献唐对吕振羽的中国古史研究和一系列新观点的提出,在史料方面的确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因此,可以说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上的成功,与王献唐的帮助是分不开得。”而以往有的学者在论述近现代学术史时,视不同学派之间“势如水火”,这种看法应当改变。显然,作者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

在梳理、论述丰富、复杂的人物行事、学术现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问题,是本书作者的苦心追求。例如,本书第三章“王献唐与近代图书馆事业”,共分五节二十个子目,字数约17万字,是作者用力最勤、占全书字数最多的一章,极其详尽地展开了对王献唐为近代



图书馆作出巨大贡献的理念、活动、功绩和影响，而在全章结束，作者特意安排一个子目“附语”，一共提出并探讨了七个理论问题：(1)“近代图书馆‘开民智’与‘保国粹’办馆宗旨之历史地位评价问题”；(2)“中国逾百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顶峰在 20 世纪 30 年代”；(3)“近代图书馆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馆法——《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之关系”；(4)“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关系再评价”；(5)“国学及国学大师与近代图书馆互为因果之密切关系探析”；(6)“20 世纪我国图书馆的代表人物皆出现在近代的原因”；(7)图书馆是社会的“终身学校”。以三千余字的篇幅，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思考，极富理论性、启发性。而在全书之末，作者又精心撰写了“结语”，共有 2 万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论述了“为中华民族‘续命’的使命意识”；“崇尚与坚守的‘独立之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清代山东‘汉学’的继承者与近代‘新汉学’的开拓者”四个问题。意在通过对王献唐生平学行、学术造诣、治学理念与方法等方面之综合考察，并与近代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道德学问作比较研究，从“使命意识”、“独立思想”与“严谨学风”三个重要标准，论证王献唐当之无愧地应享有“国学大师”之地位，堪称是对全文内容的深化与提升。因此，这部专著名副其实是“兼具突出学术创新价值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底”的优秀之作。

本书结构严整，各章联系紧密，层次条理清晰，文字准确、精炼，也是一项突出的优点。对此，读者细心读后当会产生同感，我可不必赘言。李勇慧博士在图书馆学、文献学领域已有二十余年的资历，但若论学术年龄，却仍属于意气风发、前程远大的年青学者。这部著作的完成，已经为其学术研究工作提升了一个大的层次，本书出版定会在海内外学界得到良好的评价。我衷心预祝她在今后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2011 年 7 月 27 日，写于北京。